

最後的晚餐

李 曉

男，一九五〇年生于上海。

一九六六年中學畢業插過隊，當過工人。

一九七八年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，

畢業後從事編輯工作。

一九八六年發表小說，

曾獲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。

主要作品有《小鎮上的羅曼史》、

《繼續操練》、《天橋》、《機關軼事》、

《叔叔阿姨大舅和我》、《節日》、

《挽聯》、《宿命》、《相會在K市》。



李曉

(京) 新登字第124号

最后的晚餐

著者： 李晓

出版： 华艺出版社

发行： 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印刷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开本： 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 10.25

字数： 189千字

版次： 1993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 00001—10000

书号： ISBN 7—80039—539—1/I·225

定价： 6.50元

序

序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

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

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推算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炼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

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看到这一些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都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作 者 的 话

作品完成了，作者又该谈些什么呢。

有时候觉得此时的谈比写更难。

文章是糊里糊涂写就的，又糊里糊涂发表了，却不太敢糊里糊涂地谈论。骨子里还有种惶惑，干这行是不是误入了歧途。

收入这集子的是近两年的新作。下笔时自我感觉不错，搁笔后再看，那些感觉却都不知去了哪儿。

对自己的作品我无话可说。或许话原本就那么多，变成了文字，留在嘴里便没了。

一次在街上遇到位旧友，问近来在忙些什么，回答写过几篇小说。旧友便一惊道：噢，软刀子杀人？

这是二十多年前的老话，如今听起来真是倍感亲切，就象收音机放出的“红太阳”。

可以庆幸的是，并非任何人拿着软刀子都能杀人。

一九九二年二月于上海

新 蘭 香 刊

。此公什世新又香刊，下如宗品非
。敢更言出菊的知此新世刻加育
太不味，下素武翁聯里聯又，的錄官翁聯里聯景章文
野景不景計效干，應對特官五里干骨，出應此翁聯里聯章
。新如丁人
，帶不景聯自刊學干。新錄的羊兩張景的干素玄人地
。此聯丁去味不聯味景聯些聯，香再計學聯
變，素公聯錄本類甜有與。新世甜天舞品非的自自校
。下好野里聯香留，室文丁如
官答回，公什世計香來張回，文印對後景上素玄一
？人余干氏燈，題，新就一期文印。新小篇几張

把胳膊上的针头拔掉了。

院方的^要领导商量过后，决定给予强化的治疗方案。他们利用橡皮管把叶阿妹两只手臂高高绑在床架上，然后给她插入静脉导管和鼻饲管。（叶阿妹静卧躺着，医生忙碌的时候，
她没有任何反抗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好像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。

维持生命的液体通过一条塑料管源源不断地流入叶阿妹体内，但他们却没能留住她的生命。叶阿妹只勉强地多活了五天，五天中她没有离开病床一步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甚至没睁开眼睛，这五天无疑是她一生中^{最漫长最孤独}的日子。

叶阿妹的孙俊医院陷入窘境，他们无法支付，因为市领导再三指示过，要尽一切努力，一定要留住叶阿妹的生命，至少得让她把话留下。院方也确实尽了全力，他们请了最强的医生，^{拿出最好的药}，^{最积极的治疗方案}，然而四天无果。还在^{继续治疗至叶阿妹那时}，^{（病危阶段）}主治医师^{（病危阶段）}私下告诉家属，告诉她这是绝症了，“你不是替自己辩解，”
那医生摸着脸苦涩说，“真的，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是她自己把生
命力给耗下了。”

据说医生的见解，生命其实都可以被视作一种物理

目

录

序	夏 衍 (1)
作者的话	(5)
天桥	(1)
相会在 K 市	(59)
挽联	(98)
节日	(138)
最后的晚餐	(154)
宿命	(192)
叔叔阿姨大舅和我	(212)
民谣	(263)

天 桥

下了火车，我就看到了那座桥。那桥架在两山之间，从站台这边望去，就象是在天上。我要去的地方叫卧牛关。三国演义上说，刘备的副军师庞统，外号凤雏先生，他领兵来到落凤坡，中了埋伏，把命给送了。我娘是属牛的，偏偏也就死在了卧牛关。这究

竟是不是碰巧，坐在车上的几个钟头里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只是没等我想出个究竟，火车已经到站了。

我随着人群一块下车。我想我的模样大概不太合群。在这个小站下车的都是些赶集回来的农民，他们头戴草帽，肩上扛着扁担，扁担一头还有个用绳捆上的空麻袋，只有我是一个是从城市里来的。于是我摘下刚戴上的黑眼镜。正午的阳光，一下照得我头昏眼花，我赶紧把手遮在眉沿上。透过指缝，我看见了那座桥。

我走到站台尽头，那里有一道用青石砌成的胸墙，墙外边便是笔直向下的陡壁，大约有几十米深，直落谷底。我撑住墙，探身向下望，谷底没有水，只有些大大小小的圆石，也许从前有水，已经流干了。

桥就架在两面陡壁之间，好象横在我头顶上。隐隐能看出一条小路，从这边的乱草丛中一个石阶一个石阶下去，越过底下的圆石，再从对面一个石阶一个石阶爬上来。在对面的桥基旁，有一个石头垒成的象牌坊似的东西，想来那就是关。我不由得说：他妹子的，这可真是一座天桥哪。

“喂，那个人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！”

候车室门前有人对我嚷着。他大概看了我很久，准不知我想干什么。“小心些伙计，”他指着我说：“有人打那儿摔下去过。就在两个月前，一个男孩，连脑浆都淌出来啦。”

我想告诉他，不只是那男孩，27年前，还有个女人也死在这谷底，属牛的女人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又想起，我也是属牛的。没错，我丁丑年生人，1957年，满二十岁。

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那个人就是卧牛关车站的站长。我走过去，问他站长在哪儿，他看看我说：“你找他干吗？”

我说有点私事。

“那就说吧，我就是站长。”他说。

我掏出手帕擦了擦汗，我说：“你们这里天真热。”

“可不，”他不怀好意地笑笑，“要避暑你找错了地方，你得去青岛。”

他说得对，我不是来避暑的，我来是为了找老娘的坟。可这事说起来有点麻烦，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问你母亲的坟怎么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得告诉他们一个很长的故事，等我讲完了，他们又会问，你说你母亲去白马湖看你，可你在白马湖干什么，于是，又有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
我已经讲了两天了，前一天在南京，再前一天在蚌埠，还不算请假出来时在厂里讲的那几遍。我想，要再这么讲下去，总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说书人。

有一阵子我并不忌讳说我的故事，我想这不是丑事，至少不是我的丑事。可听我讲过的人好象都不这么想，大学

生就直截了当说我活该，他说这一切全他妹子是我自找的。

1957年，我二十岁，在大新机器厂做工。有一天，车间主任含着支烟走到我身边，叫着我的名字。“王保，你来参加大鸣大放，给领导提提意见吧。”

我说我没什么可放的。

“上面号召这个，”他说，“你就带个头，不过是写张大字报，发几分钟言的事。”

“我忙着呢，没那个闲空。”

“别忘了，你还是生产班长喔。”他把烟头在我的车床上摁灭了。

我带了头。我是生产班长，团员，厂足球队中锋。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读夜校，学习机械制图和俄语。我梦想有一天能和苏联专家脸对脸聊天。现在，除了达斯维达尼亚和赫拉肖之外，一句罗宋话都记不起来了。

我写了七张大字报，我想一家伙超额完成算了，省得以后再加任务。在车间整风会上，我的发言达两个钟头，这是因为我不知说话的缘故。后来那些审查我的人说我是狡辩，其实这是真的。会说话的人有思路，条理清楚，一点两点三点，就把意思说完了。可我呢，这辈子从没上过讲台，而且我连手表都没有，我怎么能知道自己讲了多少时间呢。

我特意换上了新的制服，把要说的话默诵了好几遍，坐到讲台上，我先说了句“同志们好”，底下的声音比我更响，班组里的小伙子齐声说：“王保你好”。他们一起哄，我脑

子全炸了，等下得台来，都想不起自己说过些什么。我问主任觉得怎么样。

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扯你爸爸踩三轮车，你妈妈刮鱼鳞干什么？”

大学生听我说起这些事，从床上一蹦子跳起来。那天夜里非常冷，门前水塘上的冰结了半尺厚，我们住的近二十米长的大草棚里，呼呼刮着风。可他竟然掀开被子，光着两条细腿跳到我床边。“你活该，”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，“让你写张大字报，你一写就是七张，让你发几分钟言，你一发就是两小时，要碰上我，我也得说你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。他妹子的，你这不是自找是什么！”

“你才活该呢，”我说，“难道你妹子的就不是自找？”

他站在我床前愣了阵，然后一跳一跳蹦回去，钻到床上，把被子蒙住头，再也不说话了。

大学生没有还我嘴，因为他确实比我更自找，还因为我是三班的班长，他干活离不开我。割稻的时节，队里给我们的定额是每人一亩八分地，他割过一亩四便躺倒了，余下的全是我带着割的。

我笑他说：“瞧你妹子个大学生，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，究竟能派什么用处。”

他倒在麦捆上连连喘气：“你不能以貌取人嘛，说不准哪天，你也会要我帮忙的。”

想不到后来他真帮了我大忙。他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，

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婆。

我在讲台上出洋相的几个后，反右运动开始了。风向一变，我倒成了别人写大字报和发言的靶子。据说因为我是工人，不能定右派，他们给我安上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。再过了一阵，厂里决定送我去白马湖农场劳教。

出发那天，车间主任陪我到厂门口，他拍拍我肩膀，语重心长的说：“王保，好好干。青年人摔个跟头没关系，下去锻炼两年，再回车间，我把那部车床给你留着。”他说话的口气，就象是送我去光荣参军。

不光是他，就连我老头，我自己，当时也没把劳动教养当成件事。我们是苦人家出身，靠劳动吃饭，在工厂是劳动，去农场也是劳动。何况我家本来就是在苏北乡下，是因为打仗，才逃难到上海来的。

那是1948年，过了两年，1950年，上海刮台风发大水，我们全家又逃难回苏北去。那时我已经十三岁，差不多的农活都能上手。我不怕下乡，我老头象是还有点高兴，在我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，他唠叨没完地谈乡里的旧事，当然，都是些有趣的事。

前不久，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回忆文章，那上面说，1950年，上海市长陈毅想把上海的苏北难民动员回乡，他派出许多干部去做工作，但毫无成效。到夏天，台风一刮大水一起，不用动员，那些难民一个不剩全跑回苏北去了。陈毅召集干部们开会，在会上说：“想不到我们这么些个共产党员，还不如一场台风大水。”